

試談農諺與農村階級鬥爭

中文系學生 楊 興 政

諺語，是我們的民間文學的一宗豐富遺產。農諺，便是其中突出的一種。它是我國農民數千年來在生產實踐和階級鬥爭中提煉出來的東西，特別是解放後大量產生的新農諺，在反映我國農民新的生活和新的精神面貌方面，有着不可忽視的作用。我們從新舊農諺的研究對比中，不僅能得到有益的生計知識，而且能激發我們的階級感情，從而憶苦思甜，更加熱愛新社會，熱愛共產黨，更好地朝着革命化的大道前進。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就時常翻閱《俄語詳解大辭典》所引用的諺語和有關的民間創作，稱贊他們是“多麼有意義的材料！”^①並且指出：“根據這些材料是可以寫出很好的、關於人民的憧憬和期望的研究的論文的。”^②高爾基對諺語也曾有過極高的評價，他說：“一般地講來，俗語和俚語，是把勞動人民所有生活上的社會歷史上的經驗，都典型地予以形象化了。”^③再如我國新文化的旗手魯迅先生，不但在《南腔北調集》等著作中對諺語作了理論上的闡發，而且還在他的很多文章中加以創造性的運用。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也經常教導我們文藝工作者，要重視人民大眾的“萌芽狀態的文藝”，注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他說：“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文學藝術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造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來，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绌，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④主席說的“萌芽

狀態的文藝”除了指牆報、壁畫、民歌、民間故事等等外，諺語也是其中的一種。翻開主席的著作，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主席運用諺語來加強文章的思想力量和邏輯力量。他用“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看菜吃飯，量體裁衣”來說明無論做什麼事情得實事求是，根據具體情況辦事；用“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來說明“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用“坐山觀虎鬥”來刻畫退縮到峨眉山上游觀抗日、積極反共的蔣介石的丑惡嘴臉；用“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通俗地說明了美帝國主義必將玩火自焚；用“前怕狼，後怕虎，”形容在羣眾運動面前縮手縮腳，畏首畏尾的保守主義者。主席在自己的著作中經常引用諺語並賦予新的內容和生命，為我們提供了學習和運用諺語的典範。下面，我只想就農諺的階級性和新時代新農諺的內容，作一些粗淺的探討，為的是拋磚引玉，使大家更好地重視搜集、整理和研究農諺的工作。

中國歷代農民，在地主階級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之下，過着極端貧困和痛苦的生活。在這種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農民被迫起來進行了數百次大小不同的武裝起義和革命戰爭。除此之外，農民也在日常的生活中或隱

①② 見 A. A 開也夫著：《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人民創作》，《民間文學》1955年創刊號，第59頁。

③ 高爾基著，戈寶權譯：《我怎樣學習寫作》，三聯書店1951年，第59頁。

④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59—862頁。

或现地对地主阶级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反抗。农谚由于它特有的短小精练、明确简洁的特点，使得它不但成为农民进行自我阶级教育的有力工具，而且也是对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犀利武器之一。它们往往能一针见血地刺中敌人的要害，揭露出反动派的丑恶本质，不愧为农民手中的匕首和投枪。

农谚说：“有月田，顶月天”，“脚踏别人的地，头顶别人的天。”多么通俗地说明了“地”是那个阶级的“地”，“天”是那个阶级的“天”，而这旧社会的“天”和“地”又给农民多大的压迫和痛苦啊！尽管他们也知道土地的重要性——“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地种三年亲如母”、“栽田五载亲如妻”、“人养地，地养人，人靠地活，地靠人长”，但是在那样的社会里，穷人怎能保住自己的命根子呢？地主是贪得无厌、而且鬼计多端的，他们是“刁鹰飞入鸡儿场，永远没有好心肠”。“进加一，出九五”的农谚，就充分反映了地主大斗进，小斗出的狡诈和压榨。所谓“地主剥削如剥葱，越剥越细，越剥越穷”，“农民头上两把刀：租子重，利钱高，夹在中间吃不消”，“农民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多如毛”。这些农谚，正充分反映了封建地主恶霸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敲榨。从这些农谚里，我们不也可以隐约地窥见我国广大农民愤怒的火焰么？其实，在那个农民养活地主的社会里，压在他们头上的又岂止是两把刀或三把刀？遇上荒年，那就更不用说了。“荒年发财主”，这是地主掠夺农民的大好机会。要是农民一旦交不出“铁板”租子，欠上了地主的债，那就真是“穷人穷在债里，冷天冷在风里”，“欠下阎王债，不死也要脱身皮”，“债是一根无头绳，解不开它捆死人！”最后农民还是不得不卖田卖地，甚至卖儿卖女。农谚说：“地主算盘一响，农民眼泪直淌”，“地主算盘叮噹响，

穷人押地出村庄”。这的的嗒嗒的算盘声，不正象地主用竹槓敲打农民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吗？当地主算盘珠子轻轻地往上一拨的时候，也正是农民的生命财产被一笔勾消的时候。因此，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农民终于认识到了：“冤有头，债有主，千恨万恨归地主”。所谓“地主有田千条路，农民无田命一条”，这从今天的观点看来，当然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地主之所以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仅在于他们有多少田和地，而且在于他们掌握了枪杆子，掌握了政权。但从这些农谚里，我们不正看到了农民的血泪生涯的悲惨遭遇吗？农民把自己的怨和怒发洩在生长五谷的土地上，其实也正是农民对血淋淋的现实进行反抗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上无片瓦之覆，下无立锥之地”的破产农民，即使不亡命异乡，也会困死在原来的土地上。所谓“卖马不离槽”说明农民一旦离开了土地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因而他们只好又租地主田种或给地主帮工，给地主当牛马。这真是“财主坐马喜，穷人变牛苦”了。然而这也并不能改变农民的命运。因为地主的心是极其狠毒和贪得无厌的。所谓“地主的心，门头钉”，“地主的心，毛铁钉”正是最好的形容。地主确是“有得千田想万田，有得万田想成仙”的。对待“磨骨头养肠子”的帮工，他们往往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他们甚至异想天开，希望“太阳钉死在南端”，以便农民没日没夜地为他们干活。在这种“请工的图做，做工的图吃，累了一天到黑，还是端出一盆猪食来”的牛马生活底下，长工们连自己都难以糊口，更不用说照顾家中老小了。“外头摇断脖子，家里饿断肠子”，“外地打场，家里饿煞亲娘”，“外边打哩哩，家里饿死老爹爹”，所有这些，正典型地反映了广大农民水深火热的生活。

还有许多农谚，生动地反映了地主和农

民苦樂懸殊的生活。“有錢人家春常在，窮苦人家災有餘”，就是這種情況的典型寫照。如果說，“地主鋪的褥子蓋的被，窮人墊着稻草睡地”，“富人剝皮吃肉，窮人和糖吃粥”，“富人花天酒地，窮人呼天哭地”，“富人一席酒，窮人半年糧”，“地主頓頓肉，農民天天瘦”，……等等農諺還只是從物質生活的對比來進行揭發的話，那麼，“下不得毒手，成不得財主；殺不得窮人，積不得財富”，則不僅鮮明的對照了兩個階級的生活，而且还道出了兩個階級對立關係的實質。一邊是在殘酷剝削下的飽含淚水的沉重勞動，过着辛酸的生活，一邊是富人在剝削窮人的基礎上过着任意揮霍，飲酒作樂的腐化生活，這不禁使我們想起了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名句。它們都是血和淚凝成的控訴啊！再如同樣是租田，農民說“租田容易繳租難”，厚顏無恥的地主却說“租田容易收租難”。這裡僅僅是“收”租與“繳”租的一字之差，却尖銳地反映了兩個階級的對立。這正象《紅旗歌謠》里一首所說的：“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樹開什麼花，什麼時代唱什麼歌，什麼階級說什麼話”了。

前面說過，地主的心是狠毒的，然而也是狡滑的。他們有時也把自己打扮成“救世的觀音”，偽善地欺騙農民。但紙終於是包不住火的。農民積几十次乃至几百次的鬥爭經驗，清楚地認識了地主惡霸的吃人本質：

地主婆，狐狸精，洋糖嘴，辣椒心。

地主嘴里說出糖，腰里拔出殺人刀。

地主臉上笑呵呵，心里藏的毒蛇窩。

長工憐憫主人，如同給狗扔骨頭。

救了落水狗，反來咬一口。

見蛇見蠍，不打作孽。

這些農諺，雖然只有寥寥幾句，然而它卻一針見血地揭露了階級敵人的反革命兩手，告戒人們千萬不要被地主的甜言蜜語所迷惑。特

別是後面幾句，很容易使我們想起魯迅先生在《論“費厄攢賴”應該緩行》中所談的“打落水狗”的名言來。再如“天下烏鴉一般黑，天下地主吃人血”，“天下烏鴉一般黑，地主都是一個樣”，“天下烏鴉一般黑，天下地主一樣狠，天下窮人一樣苦”，在幫助農民更深刻地認識階級敵人的本質，激發他們的階級仇恨方面，均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們重新進行階級教育的今天，讀起上述諺語，更覺分外的親切。

高爾基曾說，民間文學與悲觀主義是絕緣的。我國農諺正是這樣。儘管地主對農民進行慘無人道的壓迫剝削，輕視農民的勞動，霸占他們的勞動成果，但廣大農民仍在農諺中，對他們自己的重要的社會地位和勞動價值，作了熱情的肯定和高度的贊揚。象下列洋溢着革命樂觀主義的農諺——“三百六十行，種田第一行”，“七十二行，莊稼人頭一行”，“農夫不種田，餓死帝王家”，“孔子孟子，當不得我們挑谷子”，不僅對“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封建觀念，進行了大膽的挑戰，而且还很好地說明了勞動人民是推動歷史車輪前進的主人這一真理。

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代，農諺的階級色彩更為鮮明。從下面幾首短小的農諺里可以窺測到當前我國農村階級鬥爭不同於民主革命時期的新的時代特點（關於這一點，下面還要詳談）。例如，湖北武昌縣農民經常用“一個被子不能蓋兩個階級”，“人不親階級親”，“牢記過去苦，不亡血淚仇”，“牢記階級仇，不亡血淚恨”等等，去教育自己的後代決不能忘記過去，必須劃清敵我界限，站穩勞動人民的立場，其階級感情是何等強烈！還有些農諺，則強調貧下中農必須團結一致，分清敵我，貫徹階級路線，批評那種“運動靠貧農，生產靠中農”，“開會一大羣，開口同志們”，

“生产都是三种苗，开会都是同志们”的錯誤思想。农民们还編了一首幽默风趣的歌謠諷刺道：“地富中貧是一家，生产都是笑哈哈。来来往往講吃喝，不叫干爹叫干媽。”这对那些階級观点模糊，敌我界綫不清的人說来，不正是一服很好的清凉剂嗎？所有这些，无不体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階級斗争的复杂性、尖銳性和长期性这一特点。

从以上的粗略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强烈的階級性和战斗性，正是农謠的生命綫。尽管广大农民在解放前被剥夺了享受文化的权利，但他们却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謠諺语，来为階級斗争服务，所以我们說，农謠虽不是精心结构的鴻篇巨制，但却是短小精悍的投枪匕首。它们或反映农民斗争情緒的某一个側面，或给人以战斗的力量。正如高尔基所說的：“最偉大的智慧是在语言的朴素中；諺语和歌曲总是簡短的，然而在它们里面却包涵着可以写出整部整部书的思想 and 感情。”^①“事实上，也正是俗语和諺语用一种特別富于教訓的完整形式把劳动人民大众的思想表现出来”。^②

我国广大农民不仅在农謠里沉痛地控訴了旧社会的罪恶，揭露了階級敌人的阴毒面目，而且也热情地歌頌了新社会的光明和幸福。他们在我们敬爱的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打碎了封建的枷鎖，斬断了罪恶的黑手，真是拨云雾而見青天。因此他们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热爱救命恩人毛主席。他们信心百倍，神采奕奕，积极开展农业生产，支援国家建設。广大农民精神面貌的改变和对未来充满信心，无不在新的歌謠中得到反映。农謠說：“过去种田苦黄連，如今种田象过年，”便反映了翻身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后的欣喜心情。“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既对比了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截然不同，又充满了农民兄弟对党和毛

主席的热情贊頌以及对新社会的无比热爱。再如：

豇豆开花藤连藤，党与人民心连心。

瓜儿和叶一条藤，人民和党不离分。

千条大河万条江，沒有共产党的恩情长。

天上星星明亮亮，毛主席好比紅太阳。

毛澤东，毛澤东，插秧的雨，三伏的风。在这里，无论是瓜和藤，雨和风，还是太阳和月亮的比喻，无不表现了广大农民对党的深厚感情。再如“公社是明灯，党是掌灯人”、“新谷登場閃金光，人人不亡共产党”、“过去靠天餓断腸，今日靠党粮满仓”、“党是眼珠子，社是命根子，破坏党和社，斬断狗爪子”等这些带有民歌色彩的歌謠，更生动地反映了广大农民“亿万紅心亮堂堂，心心向着共产党”这一事实。

解放后在我国农村所引起的巨大变化是惊人的。十四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暫的一瞬，然而我国五亿农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却走完了旧中国农民数千年来沒有走完的航程。他们是沿着什么样的道路走过来的呢？又是用什么样的速度前进的呢？下面所引的十多首农謠，对这个问题作了高度的概括和形象的回答，閃射出照亮人心的思想光輝：

三月桃花一时紅，小农經濟一場空。

农具一家不齐全，十家互助用不完。

水靠水，树靠树，农业生产靠互助。

土改人翻身，入社人田都翻身。

人入社，精神爽；地入社，变了样；

牲入社，长得壮。

人民公社力量大，水災旱災都不怕。

人民公社显神威，千山万水听指揮。

人民公社一枝花，社員个个都爱它。

① 高尔基：《材料和研究》卷一，1934年出版；《民間文学》1961年第10期，第44頁。

② 高尔基著，戈宝权譯：《我怎样学习写作》，三联書店1951年版，第57頁。

公社好比幸福梯，天堂要往人間移。

人說娘最親，娘親不如公社親。

這些新農諺，表現了我国農民從單干到互助組，又從農業生產合作社到人民公社這一偉大現實變革的歷史過程，描寫了我国農民在組織起來這條光明幸福的大道上所經歷的各個階梯，展示了我国農民逐漸擺脫貧困，走向繁榮富強的美好遠景，表現了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偉大威力。同時，也証實了毛主席的英明預見；農民組織起來，“一經成為習慣，不但生產量大增，各種創造也出來了，政治也會進步，文化也會提高；衛生也會講究，流氓也會改造，風俗也會改變”。

新的社會，新的環境，新的生活，新的思想賦予了農諺以嶄新的時代內容。從今天的農諺里，我們再也看不到聽人擺布、靠天吃飯的思想，以及那種無可奈何、拜倒在鬼神腳下的宿命論。我們看到的是“人定勝天”、“與天奮鬥，其樂無窮”的鬥爭精神和偉大氣魄；我們看到的是“修補地球”、“要高山低頭，河水讓路”的共產主義主人公的戰鬥決心和鋼鐵意志。農諺說：“積肥千萬担，肥山變糧山”、“劈山引水翻過崗，遍地造下米糧倉”、“田里要收千斤糧，早晨起來接太陽”、“天高高不過勞動熱情，星多多不過技術革新”、“大躍進，大躍進，社員渾身都是勁”、“干劲似猛虎下山，奇跡似蛟龍出海”、“金花銀花牡丹花，總路綫開的幸福花”、“爹娘生我勞動的手，總路綫照亮我前進的心”……，所有這些新農諺，均生動地反映了我国農民在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照耀下，發揮空前未有的積極性，磨銳了他們勞動的巨斧，揮動着智慧的寶劍，高呼“喝令三山五嶽開道”的英雄氣概。再如農諺“年年防旱，時時防蟲”、“年年防旱，夜夜防火，時時防特”等等，更可以看出農民是將生產鬥爭和政治

鬥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為保衛革命勝利果實進行不斷鬥爭。又如一九六三年，我國東南沿海一帶遭受了連續七個月的特大旱災，但作了自然的主人的閩南農民，卻喊出了“旱天不旱地”的鋼鐵般的誓言。他們向新華社記者郭小川同志說：“過去受旱一片白，現在受旱一片青”。又說：“解放前抗旱靠草龍（按：指當地農民用草紮成龍放入河里求雨水的一種迷信活動），初級合作社抗旱靠水龍（按：指水車），現在抗旱靠鐵龍（指抽水機）”。①這些出口成章的語言，充分表現了農民羣眾不僅具有高昂的勞動熱情，而且還有驚人的藝術創造能力。

隨着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文化建設高潮也來了。許多新的農諺，反映了廣大農民學習文化技術和精神面貌上的巨大變化。農諺說：“技術文化兩座山，如今農民把它翻”、“文化種子送下鄉，多年瞎子眼睛亮”、“親教親，鄰教鄰，識字課本送上门”、“翻身農民喜洋洋，學了文化本領強”，以及流傳在鄂西山區的農諺“砍担木柴街上賣，文化課本買回來”、流傳在鄂中地區的農諺“機械化，電氣化，沒有文化不能化”、“共產主義是天堂，沒有文化不能上”……等等，都強烈地反映了農民學習文化的決心和積極性，充滿了鮮明的時代精神。

新社會給我国廣大農村帶來的巨大變化，還不僅表現在上述各方面，而且還表現在婦女社會地位的改變上。下列這些新農諺，便是歌頌這個變化的：“只要下力干，少婦賽壯漢”、“婦女下田干，糧食增一半”、“男也勤來女也勤，為了增產一條心。”在這裡，婦女不再依附男人，沿着鍋台轉了，她們不再是“小腳一雙，眼淚一缸”，“牛屎壘田不壯，女人說話不當”了。

① 郭小川：《旱天不旱地》，1963年6月21日《人民日報》。

她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获得了独立，所谓“吃老公，着老公，灶里无柴烧老公”、“只有一船摇两橹，嘿拔一女嫁二夫”，“秤不离砣，媳不离婆”、“天子出头夫作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妇女们和男人一样，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和生产斗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力量。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广大群众干劲的充分发挥，农村的新风尚也树立起来了。他们说：“爱社如爱家，勤劳为大家”、“工农团结紧，生产日日新”、“人交心，树交根，天下农民一家人”、“耕田要用犁，生产要心齐”、“要想多打粮，大家细商量”、“社员一条心，黑土变成金”，无不反映了社员的集体主义思想和爱社如家的新风尚。

从上面所说的新农谚的几个主要内容看来，我们可以看到农谚在解放后已经起了质的变化。歌颂新社会，赞美新生活，歌颂党和毛主席，已经成了新农谚大量表现的主题。在艺术上，由于新的内容和许多新词语的注入，也使得它比解放前的农谚显得更为刚健清新、朴质雋永；不仅通俗易懂，而且还带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它在促进生产斗争，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方面，均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农谚说：“别看都是口头语，撒到田里变粮棉”。

总之，农谚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象一面镜子，真实生动地表现了我国农民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感情，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前进。它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朴素凝练的艺术形式。正因为这个缘故，它在我国广大农村里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而且为历来的文艺理论家和诗人作家们所重视，特别是生活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诗人和作家们更从民间谚语里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例如周立波同志在创作《暴风骤雨》这部著名作品的时候，就曾广泛地运

用了流传在东北农村里的民间谚语来帮助他塑造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李准同志为了迅速反映河南农民的变化，歌颂新人新事，也在《耕云记》这篇小说里吸收了流传在河南农村里的气象谚语来帮助他创造肖淑英这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人物形象。农民诗人王老九，更是创造性地将农谚运用于自己的诗篇中，为他的作品增加了不小的动力。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

当然，过去时代的农谚里也可能包含着有一部分封建性的糟粕，不是全部都可以继承和运用的。因此，研究农谚，必须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批判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粗略的一想，谚语固然好象一时一代一国民的结晶，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的意思。现在就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来做例子罢，这乃是被压迫者们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而压迫者是不算在内的”。①

这就告诉了我们，在阶级社会里，农谚也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有的东西成了反动统治阶级用以奴役人民的手段。我们在研究它的时候，是应该认真进行分析和批判的。

农谚的内容极为丰富，它几乎是广大农民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全部经验的总结。我这里所谈的仅是它的一个方面，而且谈的很不全面、深入。我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文学工作者、语言工作者和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来从事农谚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工作。这无论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民族化、群众化，对研究我国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历史，或是对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来说，都是大有好处的。我的这篇短文，不过是一块引玉之砖罢了。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414页。